

隨筆·觀察

# 「同志」的言說

## ——對比閱讀《品花寶鑑》和《東宮·西宮》

● 張 體

同性戀問題是近年來國內外社會學者關注的熱點，而搜尋文學作品中所透露的明清「同志」風尚並與當代此類題材的文本並置閱讀，我們也許會發現中國大陸男同性戀者生存態勢的歷史與現實文化處境，以及其間風俗流變的急促和詭異。本文將對晚清著名的同性戀文本《品花寶鑑》與王小波「同志」型題材的舞台劇本《東宮·西宮》進行一番比照閱讀。

### 一 敘事資源：從感同身受到抽樣調查

《品花寶鑑》採用了傳統白話小說的章回體形式，全書共六十回。作者陳森在自序中說：及秋試下第，境益窮，志益悲，塊然塊壘於胸中無以自消，日排遣於歌樓舞榭間，三月而忘倦，略識聲音技藝之妙，與夫性情之貞淫，語言之雅俗，情文之真偽。可見，《品》的敘事資源多直接來自作者的現實生活，這也為我們從側面洞察

晚清的「同志」風氣提供了良好範本。雖然作者一再聲明「首尾六十卷，皆海市蜃樓，羌無故實」，但書中的大部分人物似乎都不難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對應的原型：如書中「模範情侶」田春航與蘇蕙芳，即影射乾隆朝狀元畢秋帆及被戲稱為「狀元夫人」的「寶和班」名伶李桂官，而書中調戲琴言的侯石翁也不難看出文人袁枚的影子，侯提在琴言扇上之詩：「取看紈扇置懷中，忘卻歸還彼此同。搖向花前應一笑，少男風變老人風。」也能在《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二十四中找到原文<sup>①</sup>。

反觀《東宮·西宮》的成書過程，則更具研究的況味。王小波最初是在1989年與李銀河女士共同開展對中國大陸男同性戀現狀問題的調查而接觸這一課題的。翻開這項研究工作的成果之一《同性戀亞文化》，我們不難找到許多《東宮·西宮》中的原生態情節。據王小波夫婦調查，「東宮」、「西宮」是男同性戀者對北京兩座條件較好的公廁的戲稱，王小波以此命名劇本，書寫對象已十分明顯。他為

《同性戀亞文化》撰寫的《A的感情生活》一節中，劇本主人公阿蘭的形象已隱約可見，尤其與小學教師相識、相戀一場，幾乎被原封不動移至劇本裏。阿蘭被司務長侮辱的情節則源於一位「同志」被熟人敲詐的口敘記錄，而整部劇的核心情節基本脫胎於一位被調查者的親身經歷——被警察抓住反成功將其勾引。

對比兩個文本的寫作背景與敘事資源，我們不難發現其間耐人尋味的變化。順治年間，李漁就寫出了由男同性戀引出的迫害和復仇故事——《萃雅樓》，被《品花寶鑑》大肆效仿的《紅樓夢》中更不乏對「同志」戀情的讚許或嘲諷的描寫。貫穿於晚明至清代整個士人階層蔚然成風的同性戀時尚在文學作品中似乎總是一個「在場」的現實性命題，所以，陳森對「同志」戀情的玩味、欣賞甚至美化，只不過是波及明清兩代的「男風」在文學作品中放大或縮小的投影罷了。

隨着相公私寓制度在清末民初被政府取締，中國大陸的男同性戀者似乎很難找到公開交往的場所，而綿延近四百年的「同志」風氣也逐漸煙消雲散。這一話題似乎已淡出社會生活，被人遺忘。王小波在自陳研究報告的優點時還說<sup>②</sup>：

在於首次發現了中國大陸也存在着廣泛的男同性戀人群體，並且存在着一種同性戀文化。

《東宮·西宮》的寫作便脫胎於這種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抽樣調查，與陳森時代知識份子親身參與大力倡導「同志」風尚迥然有別，王小波的寫作動機源自男同性戀事實存在而又被置於

社會盲點的現實尷尬處境。同一敘事資源由流行文化蛻變為學術考察本不足為奇，耐人尋味的是這種變遷並非源自「同志」現象自身的消歇，而是人們對其認識態度和方式的急促轉移，這也造成了兩個文本截然不同的言說姿態。

## 二 言說姿態：從自覺整合到拒絕收編

《品花寶鑑》極盡纏綿悱惻之能事，將一群色藝俱佳的小旦與情義並重的恩客間「可歌可泣」的羅曼史娓娓道來，又重點鋪衍了貴族公子梅子玉與當紅伶人杜琴言這對有情人的故事。誠如王德威所言：梅、杜不過是清初已降中國愛情感傷小說典型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劣質翻版<sup>③</sup>。對異性戀情矯揉造作的拙劣模仿貫穿於這對「同志」戀愛過程的始終。

從晚明到清末，雖然社會上「男風」盛行，但人們寬容、讚賞或傾慕的始終只是同性戀中的主動一方，作為被動一方的相公不僅得不到同情，甚至連得到人格上起碼的尊重也是一種奢望。相公本質上與妓女相同，都屬於缺乏自我保護能力而任人擺布的弱勢群體。陳森在寫作中一面對「士」的優越感心馳神往，一面又竭力將正面形象的伶人塑造成出身清白不得已墮入風塵、且尚能吟詩作對又用情專一的「情種」。甚至假仙壇扶乩之際，裁定琴言前生為名士屈道翁嬌女，當場結成父子，終於使他擺脫「花部」而歸入「士」的行列。這成為琴言個人命運的一道分水嶺，也凸現了作者力圖調和宗法禮教與小說敘事內在矛盾的

「別有用心」和「不懈努力」。這種扭捏造作的言說姿態，一面固然暴露了「一個原本頗有挑戰性的主題，如何可被一個奉行傳統敘述的二流作家所馴化」<sup>④</sup>，不容忽視的另一面卻是「同志」敘事力圖整合到傳統才子佳人模式以換取合法身份的言說自覺，進而彌補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式主動與被動方完全平等的裂縫。《品花寶鑑》的確是一幀展示晚清「同志」風尚的社會畫卷，但更是一幅耽於陳森個人幻想之中過於理想化因而顯得單薄和粗糙的平面圖。畢竟，就陳森所處的時代而言，他遠沒有探索這一題材內在道德困境的視界和能力。自覺整合是他輾轉於「同志」戀情如火如荼的現實情況與異性婚戀傳承子嗣不可僭越的禮法尊嚴間，委曲求全又一廂情願的言說指歸。

王小波對「同志」題材的考察與駕馭遠遠立體和深刻得多。他從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的廣泛視角聚焦這一敏感話題，而對西方性理論，如S/M話語的大膽運用與發揮，更使整部劇充滿了詩性的張力和蕩人心魄的美感。與陳森時代同性戀者內部主動方、被動方地位懸殊矛盾突出不同，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大陸，同性戀已被大多數人視為「社會醜惡現象」，列入了應當根除之列<sup>⑤</sup>，就像劇本裏小史總是呵斥阿蘭「有病」、「賤」一樣。白先勇也說：在中國，同性戀並不是一種罪，頂多被社會認為是「傷風敗俗」，沒有基督教那樣的宗教制裁<sup>⑥</sup>，但正因為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sin”，相應也就沒有爭取被法律認可的正當權力與自由的可能，在一片曖昧的含混與靜默的羞恥間，同性戀行為只有在陰暗的角落隱秘地滋生、蔓延。這

種見不得光的現實處境，使同性戀只能作為異性戀正常形態的反面教材，在一片「變態」的叫罵聲裏，主動方與被動方共同承擔着蹲在派出所牆腳的屈辱命運。王小波將劇本主人公設置為警察和同性戀者的對立身份，正暗示着這種社會廣泛意義上「常」與「變」的尖銳對立。

然而，與陳森笨拙地將個人言說收編到才子佳人式異性戀主流敘事模式迥異，王小波在刻意調侃、嘲弄進而質疑異性戀與同性戀絕對二分的預設性強暴以及與現實生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阿蘭出場時本是個被警察小史逮住的「傷風敗俗份子」，卻在交代完所謂的「毛病」後，引誘小史發掘了潛藏於內心深處的同性戀傾向，並拜倒在阿蘭的「石榴裙下」。在一個視異性戀為理所當然的話語系統，這種辛辣的反諷無疑灼痛了絕大多數「中規中矩」的眼睛。也恰恰是這看似突兀且不合時宜的呼喊，標示了王小波奔放勇敢、拒絕被主流話語收編的寫作姿態。初看起來，無論是陳森的自覺整合還是王小波的拒絕收編，似乎都只是「同志」敘事在主流話語環境尋找並確立言說權力的嘗試，但事實上二者所尊奉的價值取向卻有着微妙的交錯。

### 三 言說的價值取向： 從「好色而不淫」到「被完全佔有」

《品花寶鑑》中的主人公田春航曾發表過一番「性解放」的宏論——「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則以為常，好男色則以為異，究竟色就是了，又何必

分出男女來？」而《東宮·西宮》中的阿蘭也發出過類似的獨白：「我又何必是女的——我又何止是女的呢？」「一個人生來是男是女，真有那麼重要嗎……」兩個文本似乎都指向打破生理性別自然二分的界限，強調「情色」突破性的自由與美感，但仔細揣摩就能發現兩者深刻的差異和根本的區別。

作為士人階層正面形象的代表，田春航的表白正是陳森「好色而不淫」寫作宗旨的具體體現，這種「友優而不狎優」的新型士伶關係是以士人無所不在的優越感為前提的。《品花寶鑑》中的一些相公之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全在於士人的賞識、指導和保護。這些有錢有閒的貴族公子樂於享用並竭力營造「男風瀾漫」的自由，本質上是同性戀中主動一方又恰好處於整個社會統治地位的自由。因為清朝政府一貫嚴令禁止官紳嫖妓<sup>⑦</sup>，所以，清代盛行一時的「鬪小旦」之風不過是父系當權者公開對陰柔美的渴望一種合法而又變態的方式。士人樂意將過剩的智慧和精力消費於制定、戲弄乃至顛覆禮法條規的「角力」中，而在伶人階層預設的軟弱、被動的抗拒與卑微的逢迎間，映照、欣賞、陶醉於充滿優越感的自我鏡像。

《東宮·西宮》中的阿蘭不僅因為是個「同志」而奔逃於警察的拳頭和棍棒間，作為同性戀角色中被動一方，也屢遭「同道中人」欺侮和虐待，但他對跨越性別的弱者身份心甘情願的認同與承擔，源於對自我無限舒展空間的幻想和追尋，在洞徹了「人生在世，除了等待被佔有，你還能等待甚麼」的弱者宿命後，他咀嚼着「美麗召之即來，性也可以召之即來」的自由

與苦痛，在施虐者的殘忍裏觀照、玩味甚至不斷重塑自我，享受並吞嚥生長在人內心深處本能欲望媚感的美麗與沉重的苦澀。

對比兩個文本中價值取向的詭異流動，我們或許可以觸摸到中國大陸男同性戀風尚蛻變的痕迹。《品花寶鑑》中的同性戀不過是矯情的浪漫，《東宮·西宮》中的同性戀卻是痛苦但快樂的自我追逐與歷險。也許，我們聆聽的只是少部分「同志」的聲音，但我想，言說與想像不僅代表着敘述者個人的話語姿態，也聚焦了一個社會文化的廣泛投影，這背後風俗的遷移與流變是深遠而巨大的……

#### 註釋

- ①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562。  
②⑤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278；280。  
③④ 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23；25。  
⑥ 蔡克健：〈訪問白先勇〉，載《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頁549。  
⑦ 有關晚明及清代男風的資料，可參見如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1984), 201-31；孔另境：《〈品花寶鑑〉史料》，收於《品花寶鑑》（台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附錄，頁769-74。

張 體 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專業2002級在讀碩士，目前主要研究明清以來漢語言文學中的同性戀文本及書寫現象。